

# 廖承志一家在香港统战

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香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廖承志一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廖承志的三重身份

廖承志在香港时身兼三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同时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还是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建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建议由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办事处。1937年10月，毛泽东与廖承志进行长谈：“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谈话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3项职责：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动态向中央报告。

1938年1月初，廖承志抵达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刚开始在宋庆龄家中开会和办公，后来会址设在西摩道21号。保盟积极开展工作，广泛联络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敌寇的英雄事迹，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廖承志充分发挥“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地方党的协助下，发动香港海员工会、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学生赈济会、晨钟社等团体进行义卖募捐；一方面广泛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为了方便华侨捐款的接收，廖承志通过他在华比银行任副经理的表妹夫邓文钊，在华比银行开设账户，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

1938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的指示，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由曾生、周伯明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

此外，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成立、发展、壮大均与廖承志的支持、帮助、组织密不可分。廖承志发起和领导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为建立和发展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的贡献。



1909年廖仲恺(后右)、何香凝(后左)及廖梦醒(前右)、廖承志(前左)在东京。

## 何香凝参与了“所有救济活动”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廖仲恺、何香凝带廖梦醒和廖承志去孙中山家道贺。廖梦醒说：“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廖承志也尊敬地称宋庆龄为叔婆。他说：“叔婆，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中国大同盟以来我姐姐和我尊称她的专用语。”

“保盟”由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梦醒任办公室主任。廖梦醒担任“保盟”的办公室主任，目标主要有2个方面内容：(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二)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从世界各地募集捐款、医药物资，在香港的3年多时间里，共送出120多吨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平均每个月送出3吨。华侨每捐一笔款，何香凝就送一幅画。宋庆龄曾说，抗战时期，何香凝参加了我举办的所有救济活动。宋庆龄每收到一笔捐款就会在捐款收据上签名。甚至许多人为了得到她的签名而捐款，为此宋庆龄“磨破了自己的手指”。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宋庆龄表示何香凝参与了自已组织的所有募捐活动。

## 邓文钊亏钱办《华商报》

1941年2月10日，在《新华日报》受国民党压迫，其他在港媒体被收买的情况下，廖承志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华商报》。由邓文钊亏钱办。”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

廖承志让邓文钊、邓文钊兄弟出面，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办报。办报方针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

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报纸——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定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声，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为了增强华商寓意，头版中还刊载了何东爵士题词“唤醒侨胞”。

《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到8月底，《华商报》成为香港晚报销量王者，超过5500份。

廖承志表示，《华商报》开办迄今(8月)由邓文钊出资，由于稿酬丰厚，每个月亏损3500港币。为了弥补亏空，邓文钊用2万港币购买香港科学印务公司，同时和陈嘉庚合作准备筹办日报。胡绳曾评价邓文钊：“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华商报》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国民党对《华商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压迫取缔，一是由戴笠出面，向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时提出取缔《华商报》的要求；二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由比利时政府向华比银行施压，逼迫邓氏兄弟停止督印《华商报》；三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不给《华商报》发通讯稿，并企图破坏其与印刷厂关系。廖承志针对国民党的破坏，一方面请宋庆龄与俞允时沟通，另一方面请周恩来与英方进行沟通协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九龙机场。《华商报》连日发表社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8日发表社论《一致打倒日寇》，9日发表宋庆龄文章《战争来到香港》，号召对法西斯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11日发表社论《为反侵略加緊团结》，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停刊。

(李向锋)

# 人称“王老虎”的开国中将王必成

王必成，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王必成作战英勇、战绩卓著，曾被根据地群众誉为“王老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被誉为“老虎团”中的“王老虎”

1939年11月初，日军多次对江苏茅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扫荡”。8日凌晨，丹徒宝堰镇日军约三十四人至延陵、九里“扫荡”，企图寻找我军目标。8日当天，驻金坛的日军又出动了200余人到这一地带“扫荡”。8时，新四军新编第6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率先与日军遭遇并发生激战，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团长的王必成接报后立即率部赶往延陵镇贺甲村增援。8日下午2时，王必成一指挥第2团等部向日军发起攻击，正当两军酣战之时大雨骤至，战场能见度极低。王必成审时度势，下令在日军阵前点燃湿稻草堆，第2团将士遂在浓烟掩护下冲入贺甲村内。经反复冲锋，白刃肉搏，我军已将日军逼至贺甲村南端大祠堂内，因此王必成决定9日拂晓再发起攻击。

9日4时，第2团第2营在向祠堂搜索前进时突遭埋伏在草堆中的日军袭击，但我军将士无所畏惧，上前与日军肉搏格斗，奋勇杀敌。日军虽不甘失败，但此时已成瓮中之鳖。上午10时，王必成一声令下，总攻开始。祠堂内残

敌数十人在我军攻势的震慑下纷纷向外逃窜，最终被全部歼灭。此战共歼灭日军168人、俘虏7人，是抗战时期苏南地区新四军歼灭日军最多、战况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后被延安军委总部通电表扬为“延陵大捷”。延陵大捷后，第2团声威远振，江南人民亲切地称其为“老虎团”，王必成被誉为“王老虎”。

## 率部勇登孟良崮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时，王必成担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号称其“五大主力之首”，战斗力强且骄横无比，曾经在两次涟水战役中给6纵造成一定损失。因此粟裕在拟定孟良崮战役作战方案时特意交代说“我向王必成许过愿，打七十四师不能少了六纵的份”。5月12日，陈毅、粟裕命王必成率6纵由鲁南取捷路北上切断74师的退路。接到命令后，王必成立刻收拢部队，边走边动员，终在14日抢攻下敌军的后方补给点垛庄，完成对74师的合围。对此粟裕曾回忆孟良崮战役中“动用隐伏于鲁南的六纵队是关键的一着”。战役打响后，6纵在孟良崮两侧奉命阻敌援军整编第25师和整编第83师。黄崖山战斗中，敌整编第25师在“只准进不准退”的逼令下，疯狂攻击我阻击阵地。王必成指挥部队忍饥耐渴，无惧

疲劳，两昼夜先后打退了敌人的10余次冲锋。尽管敌军距离孟良崮仅5公里，但就是始终无法前进一步救援74师。国民党军“里应外合、两面夹击”的企图宣告破产。

敌援军被阻后，6纵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投入战斗，向74师猛打猛攻。王必成为便于指挥战斗，将纵队指挥所前移至距孟良崮主峰4公里不到的大场山。一时间两军犬牙交错、短兵相接，战况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关键时刻，王必成命令6纵特务团冲上孟良崮。16日14时总攻开始后，特务团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首先突破孟良崮西侧，直取74师指挥所所在的山洞。此役过后，时任6纵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吴强以孟良崮战役为素材，创作了著名小说《红日》。小说中我军英雄团长沈振新原型的重来源便包括王必成。

## 和平年代高度重视部队建设

20世纪60年代，王必成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他在任职期间高度重视部队建设，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王必成在上海任职时，就曾精心培育和扶持“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典型。新中国成立后，某部8连在南京路上“拒腐蚀，永不沾”的事迹引起了王必成的高度关注。他多次深

入8连，鼓励8连全体指战员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作风，并在上海警备区党委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8连这一典型的培育和宣传，学习8连的精神意义非常重大，要争取让8连的精神在全军、全国发扬起来。1961年9月，在王必成的邀请下，南京军区文化干部沈西蒙将8连的光荣事迹搬到了舞台上，执笔创作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演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正式命名该8连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1961年10月，总参谋部军训部的《军训通讯》增刊首次公开向全军介绍“郭兴福教学法”。当时分管南京军区军事训练工作的王必成敏锐地察觉到这是部队训练改革的好典型，在看完郭兴福表演分队的示范教学后即指示，要在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自此，宣传、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南京军区普遍展开。与此同时，王必成还对郭兴福教学法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充实和总结，并向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汇报了郭兴福教学法的产生、发展和推广情况，叶剑英听完汇报后称赞道：现在全军公认郭兴福教学法是个好方法，不管哪个军种、兵种的基层连队，全国的民兵，都认真按郭兴福教学法来训练，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大提高。(范人杰)